

布尔迪厄的实践语言观

孙宁宁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 布尔迪厄批判了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学究谬误”式语言观,在继承和超越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语言观基础上,基于工作中的实践理论,建构了其独到的实践语言观,把语言置于实践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探讨了语言与符号权力(符号暴力)的关系。

关键词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语言经济学;符号权力(符号暴力)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0)04-0078-04

一、引言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是法国继涂尔干之后当代著名的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他与英国的吉登斯和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尊为当今社会界的大师。布尔迪厄所主张的社会学,不是学院式的社会学,而是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艺术、一门手艺、乃至一种技击的社会学^[1]。

对实践逻辑的发现和研究所使布尔迪厄走向了具有“建构主义”倾向的社会学。无论从其核心概念“习性”、“场域”和“资本”,还是他对于教育的文化再生产功能的分析,或是他对结构主义理论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的直率反思,都可以清晰地找到他的现实主义的唯物立场^[2]。的确,布尔迪厄的全部学说可以被理解为一门唯物主义人类学,这种唯物主义人类学探讨符号暴力的各种形式如何发挥特有的作用,影响支配结构的再生产及其转换^[3]。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力图超越主观和客观主义的长期争端,建立一元的社会学,为二元对立仪式祛魅^[2]。

布尔迪厄从批判结构主义的“学究谬误”式的语言观入手,以实践理论作为其方法论的后盾,犀利地批判了形式主义的结构语言学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在继承和超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的基础上,形塑了其独特的社会学视角的实践语言观。

二、布尔迪厄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批判、继承与超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逐渐进入巅峰时

期,出现柏格曼所述的语言学转向,所有的语言论哲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4]。

语言、世界和人的关系密不可分。传统的语言哲学把语言看做是表达、承载和传达思想观念的器物与指物述事的工具。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在“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哲学回到了对语言本身的发现和思考,贯穿了从古希腊本体论哲学到近代笛卡尔之后的认识论哲学的语言器物论受到了批判,被滥用的人本主义自我和工具理性被抛弃,语言作为社会生存的根本纬度显现了出来。

布尔迪厄在对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地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研究中,产生了对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怀疑和对建立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上的结构式思维方式的不信任。

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他提出语言是一个完整而内在自足的封闭系统,并区分了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把一切与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排除出去,只留下属于系统内部的成分^[5]。他认为研究语言既要进行历时的研究,也要根据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进行共时研究。他过度强调语言符号自身,从而将语言形式化,抛弃了对外部世界和价值判断的关注。同时,他强调语言系统的封闭性,使意义局限于作为终极所指的构造,陷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窠臼。

索绪尔区分了语言与言语,特认为语言是言语能力的社会产物,又是必要的惯例的总汇,这种惯例为社会群体所接受,使每个人能进行言语活动。而言语是个人运用自己的机能是的行为,它运用的手

收稿日期 2010-09-24

基金项目 河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84/407227)

作者简介 孙宁宁(1967—),女,江苏南京人,副教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段是通过社会惯例,即语言^[6]。随后,乔姆斯基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建立了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的二元对立模式。

布尔迪厄反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二元对立模式,认为这种基本区别使结构主义只能从模式及其执行、本质与存在的角度来设想语言和言语这两种存在属性之间的关系。这就把科学家——这种结构主义的信守者——推到了一种莱布尼茨式的上帝的位置,对于这个上帝,实践的客观意义是既定的^{[3]189}。布尔迪厄认为言说行为是一项复杂并且有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索绪尔所认为的言说行为是预先存在的一种语言系统和语言规则的执行。同时,他也批评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的看法过于抽象化,因为言说者并非具有无限制的创造语言能力,言说者知识在适当情境下具有适当表达的能力。布尔迪厄提出,言说者具有实践能力,在所有的沟通情境中,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只在语言分析范围内兜圈子,是不可能阐明沟通行为的。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以及他们分别所属的群体)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3]190}。

布尔迪厄的思想萌发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结构主义蔚然成风,但他并未与世界风相随,而是对结构主义思想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研究中,他感到结构主义方法存在为了获取超历史的共时结构而舍弃动态的社会行动者的问题,他认为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仅仅将语言视为沟通的手段,而忽视了语言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因此,他转向关注实践的社会生活,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给他以极大的启迪。布尔迪厄反对索绪尔将语言和言语分离的二元对立模式,很快接受和发展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

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的中介是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而非静态的名称关系。为了提炼出语言的这种受规则支配的特征,他将之与游戏相比,提出了“语言游戏”的概念。他指出:“当我们研究语言时,我们把它想象成一种固定规则的游戏。我们将它比为使某个游戏是这种而不是那种的限度……我也将把有语言和行为(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7]38}。因此,他认为语言游戏构成了基本的语言——世界连接,由此将语言分拆带回了现实生活世界,扬弃了其前期语言哲学的抽象逻辑分析。他主张把语言放到实践中考

察,认为语言游戏不只是语言—世界关系的中介,而且还是我们进入语言之门。语言技能就是通过训练掌握不同的语言游戏这种方式获得的^{[7]38-49}。他提出将语言分析同实践的哲学观联系在一起,语言的意义即语言的使用,只有在语言游戏的实践活动中才可能理解遵循规则的行为本身。他明确否定了私人语言的存在,认为意义只有在交往使用中才会产生,所有意义都是通过公共的语言游戏传递,语言的意义应该在语言游戏中理解。他还认为生活形式是语言游戏最后的栖身之处,生活形式是由日常的说话活动构成的,即有言语行为构成。作为语言游戏,说话活动是在主体间进行的交互行为。游戏的规则本质上都是公共的、可交际的^[8],脱离了人类的生活实践就无法理解语言游戏。

布尔迪厄受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启发,提出存在两种不同的“规则”,一种是由理论家为解释他所观察到的东西而构想出来的理论假说,另一种是实际指导行动者实践的“规则”。布尔迪厄用“策略”、“习性”及“性情倾向”等术语,来表达其与维特根斯坦的“规则”相呼应的意义。由此可见,他的社会学的实践语言观既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同时又超越了维特根斯坦,表现出既有师承又有差异的关系。布尔迪厄分析了语言和符号暴力,强调语言交流必然同历史和社会条件相关,语言交流必然包含着权力关系,因此,他的政治批判姿态显露出马克思及尼采、福柯等人的权力说的痕迹。

三、布尔迪厄实践语言观的建构

1. 建构主义的结构论

在经过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之后,布尔迪厄首先从质疑列维-施特劳斯的客观主义,开始了他的实践语言观理论的建构。

布尔迪厄用策略概念替代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规则”概念。结构主义为了获得对人类社会共时结构的构建,放逐了任何与行动者、实践有关的历史性因素,遗忘了实际人生、日常生活世界的具体逻辑。布尔迪厄强调策略是历史性实践的产物,是受集体和个体历史影响的社会实践的生成物^{[2]57-58}。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语言游戏观启示布尔迪厄,理解一种语言即理解一种生活方式,布尔迪厄之所以用“策略”概念来替代结构主义的“规则”概念,就是试图从客观结构的内在化和内在性情生成具体、充满差异性的行为这两个方面说明实践。也就是说,从主体和结构两个方向的合力,考虑实践活动^{[2]58}。据此,布尔迪厄提出了习性、场域、资本等核心概念。

习性一词最早是拉丁语词,指生存方式或服饰,以后引申指人的物理性的体态特征与内在的性情倾向,也可指个人在外部现实、教育经历及个人努力等共同影响下所形成的长期持久的生存与实践方式。布尔迪厄认为习性既体现了社会和教育过程对个人的形塑,又是人的行为的发生机制。“发生机制”这一术语的运用,是源于布尔迪厄受到了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的启发,布尔迪厄将习性看作被形塑的深层结构,而且也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并不断生产无限可能性的实践。习性是一种非天生的能力,受到特定的生存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制约,作为持久的性情倾向系统,习性既是被形塑的结构,又是建构中的结构,即习性是动态的生成系统。

习性概念体现了社会实践既非不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自由选择,也不同于受制于绝对社会规则的被通性行为,习性一面是被实践形构的性情结构,同时又作为生成性的建构中的结构,具有导向实践的功能。布尔迪厄把实践将客观结构内化的被建构过程和生成、外化的双重过程理解为“循环关系系统统一了结构和实践,客观结构倾向于生产形成行动的被建构的主观性情倾向系统,反之,行动再生产客观结构。”作为性情系统的“习性”,解释了行为是受深层的文化母体的制约^{[2] 33-64}。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习性和资本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共同致力于分析和解释社会实践^[9]。因此,从主观与客观、内化与外化、结构与建构;“习性”概念阐明了经济、社会等生存条件形塑着实践,同时实践又反作用于生存条件的复杂与多元的关系。由此,习性为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提供了新颖的理论视角^[10]。

2. 语言经济学

为了说明语言经济,布尔迪厄从经济学中借用了“市场”、“资本”及“利益”等术语。他将语言看作处于实践语境中的行动,因此,要理解语言的逻辑,就必须理解语言市场中的语言行为及其与权力、资本的关系。他认为语言习性是一套同社会等级密切关联的语言倾向。所以,语言市场与语言资本的确立是语言系统的经济逻辑得以实施的关键。他指出,统一标准的语言的形式是与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同时发生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受标准语言支配的语言市场。他以标准法语的演变为例,揭示了法国上层阶级从法国大革命时期逐级形成的“标准语言”中渔利的事实。马克斯·韦伯曾引用经济学分析教士、预言家、巫师等象征领域,布尔迪厄沿这一思路进而将经济学引入语言分析。统一的语言市场的形成,随之建立较完备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认证制度,这样支配折叠成功地利用语言,文化资本控制着被

支配者。语言市场的形成,即以统一标准的官话的形成作为标志,语言的使用是有价值的,可以像商品一样被衡量,而衡量标准是获得合法性的标准语言、文学经典语言和文雅语言。在语言市场中存在着一种客观标准与主观运用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这种紧张关系形成了语言与资本贫乏者的不利的、被支配的地位。相对于客观的、合法的权威用语而言,语言使用者受习性的支配,或利用习性倾向生产话语实践。由此看来,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并非每个行动者都享有同等的语言资本,并非像语言学家把个别话语看成是对共享的语言财富的具体挪用。一个人的用语习惯,其中包括词汇的丰富、口音、唇形,用词的雅俗、句形结构等因素都渗透着他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的影响,因此语言在塑造、再现、标示者行动者^{[2] 114-115}。

布尔迪厄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在语言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他提出“话语的效力”,即使人相信的威力端赖于说出此话的个体的权威,也就是说,依赖于此人的作为其权威性标志的“说话口气”。这样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在交往中(自然包含话语),生存的物质条件通过语言生产关系决定着话语,而语言生产关系使话语成为可能并建构话语。语言生产关系不仅仅支配着语言交流的时间和地点(通过社会筛选和排除机制决定相遇和交流的机会),还决定着交流的形式,通过话语在其中得以产生的生产关系的结构(通过发言者的权威性和专门能力的分配)^{[2] 116}。因此,语言作为一种符号表征,揭示了更为根本的经济和物质关系。由此可见,布尔迪厄的语言观越来越远离纯粹的语言形式分析,远离形而上学的语言哲学逻辑。布尔迪厄更为看重经济分配制造的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决定意义^{[2] 117}。

3. 语言与符号暴力

布尔迪厄在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与反思基础上,试图揭示语言交流与权力支配的共谋关系。他将语言研究重新引回到社会、历史条件中,运用“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来解释语言市场中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制度^{[2] 119}。结构主义语言观把语言看做是沟通的一种手段,而布尔迪厄认为语言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因而必须把语言放在生产和流通语言的互动情境和结构环境中加以研究。他指出,“纯粹”语言学的特征就是它赋予共时性的、结构的或内在的视角以优先性,认为这些因素在分析上比语言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或外在的决定因素重要。索绪尔的观点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的观点,它只是为理解而理解,并因此进而认为社会行动者也具有这种“解释学的意图”,并且把它

看作行动者实践的原则。“纯粹”语言学家采取的是语法学家的态度,而语法学家的目的是研究并编撰整理语言,这与言说者的态度迥然不同,后者力图通过言辞用以行事的能力在世界中完成各种行为,并影响这个世界。有些学者把语言看作分析的对象,而不是用它来思考,用它来交流,这些人自然会把语言视为一种“逻辑斯”,与“实践”相对,把语言看作“僵词死字”,没有实践用途,或者说除了以一种艺术作品的方式接受诠释之外,没有其他用途^{[3][87]}。

布尔迪厄指出,符号权力的生产应该置于具体的自主场域,以揭示出那些微妙的、隐藏的权力支配关系。符号暴力的意义与作用与意识形态相似,但具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布尔迪厄认为:符号权力受到双重决定,它们不仅是为其表达利益获得合法权的阶级和阶层的产物,而且还要归功于根据场的特殊逻辑生产它们的生产者(文化生产者以及文化生产场的整体运作)^{[2][20]}。布尔迪厄通过语言阐述了政治拜物教中的符号权力的语言建构,分析了语言符号系统中所渗透的符号权力的辩证关系,把社会历史关系重又引入对语言与意识形态的思考与探究中。

布尔迪厄认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他以殖民时代或者后殖民时代的殖民者(或外来移居者)与土著居民之间的沟通为例,指出殖民者采用“屈尊俯就”的策略,也就是通过一种暂时的、但却是大肆渲染的方式放弃其支配地位;“屈尊俯就”地同其交流者打交道,支配者通过拒绝这种支配关系而维持它的存在,并且从中渔利,标准的白人英语和美国黑人所操的方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策略的一个典型例证。美国黑人这一被支配者说的是一种“蹩脚语言”,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支配者白人打交道,他们的语言资本都几乎被彻底地贬斥。也就是说,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所有言语互动都受他们所分别操持的英语之间的结构关系的制约,而且还受二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的制约,这种权力不平衡不仅维持了语言的结构关系,而且赋予那种以任意武断方式强行树立的中产阶级的“白人”英语,以某种自然天成的外观^{[3][90-191]}。

布尔迪厄提出,任何言语行为或话语都是某种联系的关节点,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一方面是语言惯习,即一套社会因素构成的性情倾向,一种“表达旨趣”,还包括言说技能、产生合乎语法的无穷无尽的话语系列的语言能力,这3个方面的能力都以不可分割的方式被确定;决定言语行为另一方面的因素是语言市场,即作为一个特定的约

束和监督系统强加自身的力量关系系统,这一系统通过决定语言产品的“价格”来推动语言生产方式的更新^{[3][93]}。他认为语言虽然不是一种稀缺商品,但是进入合法语言的渠道很不平等,语言的权威来自外部,要充分理解语言本身,就要把语言实践放到各种实践共存的完整世界中,不断发展和更新。

四、结 语

布尔迪厄基于具体的实践理论,将语言置于实践语境中,阐述了语言与实践、语言与权力之间的实质性关系。他批判了结构主义的“学究谬误”式语言观,批判了纯粹的语言形式分析和形而上学的语言哲学逻辑,在继承和超越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语言观基础上,建构其独特的社会学视角的实践语言观,具有认识论上的反思性和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他注重语言和符号权力的关系,指出语言本身并不具有暴力,只有语言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政治权力和规约才体现出暴力。因此,布尔迪厄的实践语言观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如同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11],布尔迪厄把社会历史关系重新纳入对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研究之中,对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布尔迪厄. 科学的社会用途[M]. 刘成富, 张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3.
- [2] 张意. 文化与符号权力[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3] 布尔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 [4] 王一川. 语言乌托邦: 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35.
- [5]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43-46.
- [6]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88.
- [7] 辛提卡. 维特根斯坦[M]. 方旭东,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8] 盛晓明. 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 语用学纬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76-77.
- [9] 李建梅. 文化资本与晚清至五四域外文学书写语符的变迁[J]. 求索, 2010(3): 181-183.
- [10] 曹成竹. 布尔迪厄习性理论的审美人类学纬度[J]. 柳州师专学报, 2010, 25(1): 10-13.
- [11] 刘维兰.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文化基质[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2(2): 10-12.